

常任侠 著

藝

东方艺术丛谈 下

DONGFANG YISHU CONGTAN

術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



常任侠 著

东方艺术丛谈

下

DONGFANG YISHU CONGTAN

郭淑芬 沈 宁 编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目 录

埃及的新艺术 / 001

中印文化的交流 / 006

印度阿旃陀石窟艺术 / 024

优秀的印度舞蹈与音乐 / 033

从游戏玩具上看中印古代文化的关系 / 040

印度的艺术 / 053

中国与印度的傀儡戏传说 / 060

中国音乐与印度音乐在历史上的关系 / 062

气功和瑜伽

——中印文化交流之一 / 067

附 印度古佛迹巡礼 / 073

巴基斯坦的文化和艺术 / 127

一幅十五世纪初中国与孟加拉国友好的绘画

——明初榜葛刺国贡麒麟图 / 131

锡兰的艺术与建筑 / 138

中锡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/ 141

尼泊尔印象 / 145

美丽的山国——尼泊尔 / 153

美丽辉煌的缅甸舞蹈 / 157

珍贵的中缅文化关系 / 161

缅甸蒲甘壁画 / 166

中泰民族关系之过去及将来 / 169

柬埔寨的古代雕刻 / 176

印度尼西亚艺术团带来的友谊 / 18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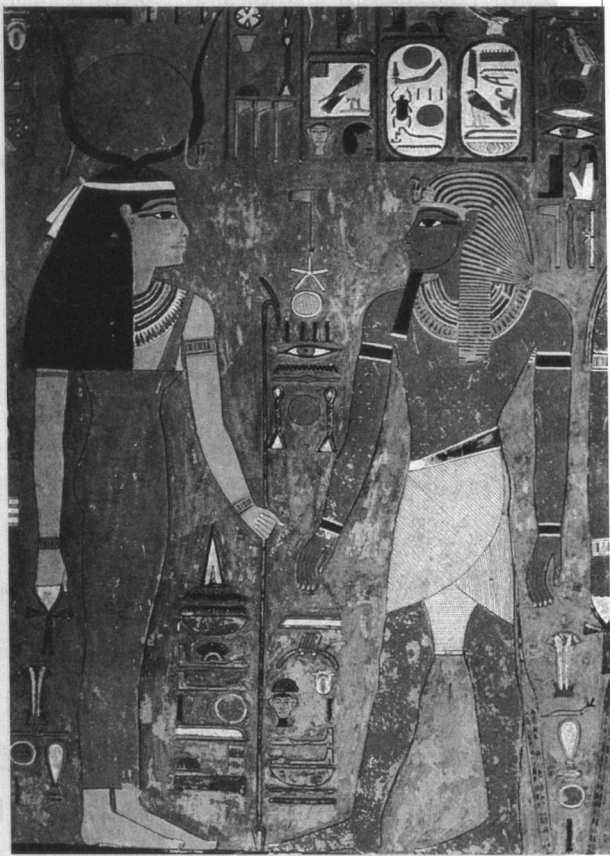
爪哇婆罗浮屠的雕刻 / 185

日本的浮世绘与锦绘 / 188
唐代乐舞东渐日本述略 / 192
谈日本歌舞伎 / 201
日本画圣雪舟在中国的旅行 / 207
日本画和中国画的历史联系 / 213
唐鉴真和尚与日本艺术 / 215
中日文化艺术的交流 / 223
日本浮世绘艺术 / 238
中日文化交流与茶道 / 251
日本南画与中国画的关系 / 257
中国的傩舞与日本的能乐 / 261
丝路与茶道 / 266

附 图目 /272

埃及的新艺术^①

埃及是一个古代文明国家,它的艺术,有悠久的历史的光辉历史。如果讨论世界的古代艺术,首先就必须提到埃及的艺术。伟大的金字塔建筑与司芬克斯狮身人面雕像,已成为古代埃及的标帜,这是人所周知的。世界许多著名的博物馆中,也大都有古代埃及艺术的收藏,那些优秀的艺术品,壮丽而写实的技法,看起来使人惊叹。埃及第五王朝的坟墓壁面浮雕中,表现了人民在使用驴子农耕和



霍伦海卜王和哈托尔神(着色浮雕) 第十八王朝

① 原刊《美术》1956年11月号。后收入《常任侠文集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版。——编者

收获的情况，也表现了家具的制造与交易的情况。在第四王朝，拉·海德布坟墓出土的浮雕中，表现了人民捕鱼的劳动情况。这使我们看到埃及人民是爱劳动的人民，并在劳动中创造了艺术，这艺术永远不朽地放射着光彩。

埃及艺术的优秀传统，是世界公认的，也是埃及人民足以自豪的。在古代雕刻和绘画中，所表现的王、后、侍女、乐伎、诸神、狮子、野牛、野鸭、戴胜、斑鸠、鹰隼等等，不仅形象准确，而且也传达出人的性格和动物的动态。在埃及的新艺术中，它承继了古埃及优秀传统的民族风格，并且又有新的发展；这次在北京举行的“埃及艺术展览会”，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个特点。

埃及艺术在我国的展览，是具有重大意义的。埃及是一个古文明国家，在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下，被压迫了许多年，人民虽受尽了苦难，但仍不断前仆后继地去同帝国主义斗争。今天在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，人民团结起来，斗争已得到胜利，并且获得全世界主持正义者的支持与同情。今天的埃及，是新的埃及；今天埃及的艺术，是新的艺术。这些艺术品，使我们看见了埃及人民渴望自由，热爱劳动，为自己独立解放而斗争的坚决精神。因此使我们更加热爱埃及，对于埃及人民，也有更深的了解。

这里首先提出的，是加马尔·埃尔·沙吉尼的两幅黄铜镶嵌艺术作品。一幅题为《自由》，表现的是一个埃及勇士，用力把铁的牢笼拉断，让和平鸽子展翅冲出。这位勇士的两臂肌肉紧张有力，面容沉郁而果决，表现出内心的要求与愿望。这幅作品正象征着埃及人民为和平而斗争的坚强力量。殖民者的铁锁，英雄的埃及人民是会把它打断的。为苏伊士运河英勇地斗争，就是一个显现的例子。同一作者的另一作品，题目是《甜梦的夜》，画面上一个骑在鸽子背上的埃及勇士，正在弯弓射箭，向着四周围的恶魔、毒

龙、蝎子等等进击,这些丑类都已一一中箭死亡。这些污秽的东西,正是那些殖民主义者,一切丑恶、敌视埃及人民、敌视和平的反动势力的象征。而埃及人民在夜晚的梦里所显现的这种愿望,也正是全世界爱和平人民的愿望。

其次我们提到加赛丽雅·西利女士的五幅组画《万隆精神》。这组画正如画题之说明,表现出了万隆会议后,人民在五项原则下,和平共处的生活。万隆会议,也就是亚非人民大团结的会议,亚非人民,曾经长期处在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下,今天要求独立与自由,要求世界和平,是他们普遍的呼声,这组画所反映的正是这种精神。人民团结在一起互相亲爱;人民在和平鸽前,充满着喜悦。画的线条是纯朴而可爱的,单纯明朗,富有感染力量。从埃及的民间艺术发展,对于当前的人民斗争,有恰好的表现。

充满着埃及民间艺术所富有的诗样情调的,还有阿卜杜勒·萨拉姆·舍里夫的两幅作品。一幅题为《祝福》,画着两位劳动的青年男女,在田野的阳光下,互相祝福。少女头顶着水瓶,以鲜美的蔬菜莱菔赠给青年;青年则以丰产的谷物赠给少女,在劳动中缔结的爱,才是纯真的健康的爱。从这个画幅里,人们可以嗅出埃及田野的香气,埃及青年一代所过的幸福生活。

作者的另一画幅,题目是《卡尔纳克庙之夜》,这是用布缀合而成的一张画。这样的艺术形式,也是埃及所特有的。画中表现的是一群爱好音乐的人民,在热带的夜幕下,吹奏乐器的娱乐生活。在人物的背景上,衬托的是埃及古代雄伟的建筑,把埃及的古代文明和埃及现代人民的乐观精神,结合在一起,表现了复兴埃及,争取埃及的独立与自由的信念。这两幅画都是从埃及的民间艺术发展而来,富于装饰趣味,也富于诗的情调。那基·阿沙德的《风景》,是用麻布补花的艺术,与前一幅作品相类。画中表现的是一

群汲水的女子,头上顶着水瓶,以各样的动作姿态,表现出劳动的韵律,使人深深体会到埃及人民的生活具有诗的美,牧歌的美,咏唱出了健康而朴素的情调。

埃及的艺术家是善于继承他们的民族艺术传统的。从他们的雕刻与工艺美术品中,我们看出他们特有的作风。例如马穆德·莫克塔尔作的纪念碑图案,就使我们看出埃及古代雕刻的风格在现代艺术中有了新的发展。还有沙耶特·阿卜特·拉苏尔的木刻圆盘,与哈桑·希石麦特所作以埃及人民生活为题的陶像,都能引起人们的特别爱好。因为它是独具民族特色的,它在艺术的园圃中,也就独具乡土的芬芳。还有使我特别喜爱的一张画,就是沙桑·阿麦尔的《农家夫妇在地里》,这张画也浓重地表现出埃及民间艺术的风格,像一首诗一样美好,它歌颂的是劳动与健康的生活。

埃及艺术展览会中还有珐琅制品,彩色玻璃制品,铁器画,线画与珠线串成的画等等。在表现方法上是多彩多样的,有些与中国的方法相同,可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久远。特别是对书法艺术的爱好,也是中埃两国艺术所同有的。埃及的书法学校,对书法有专门的研究,在铭刻和书志上,作出了不少优秀的成绩,这次展品中,就有不少精致的作品。

过去埃及的艺术家们,曾有不少浸染在欧洲的画风中,但他们在埃及的画坛上,也有卓越的成就。在这次的展品中,欧画风的作品,仍占很大的部分。这些作品色彩强烈,保持一定的独立风格。其中最使人瞩目的,是《中国舞剧》、《俄国芭蕾舞》等作品。这是亚历山大港的画家阿哈姆·旺莱、尤西夫·旺利两人的创作。这几十幅画是以速写的笔法,摄取了舞台上瞬间的印象,表现出丰富多样的舞蹈姿态,色彩鲜明而强烈,可以说是不易多得的作品。在大幅油画中,穆罕默德·西德基·穆斯塔法的《塔利尔广

场》，是一幅可爱的力作。广场的建筑物与喷水池，是画的主要部分；街车、行人、棕榈树，在灼热的阳光下，显示出热带的景色，这幅画受有欧洲印象派的影响，但它的色彩是调和的，爽朗的，表现出埃及风景所特有的情调，这幅画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作品。

还有加才拜雅·西利女士的大型油画《家庭》，和娜比拉·哈非兹女士的大型油画《艺术家加扎拜雅肖像》，在表现技术上，显然都带有欧洲现代派的影响，但它的形象是完整的，色彩是经过洗练的，因此它是出色的作品。尤其是《家庭》这一幅，构图上和表现内容上，能够集中紧凑，表达出爱感，展示出画中人物的内心世界。

还有阿麦德·沙布里所作的《弹琵琶者》、《画室里》两幅作品，和阿麦德·劳特非所作的《保姆》、《静物》和《现代城市》三幅作品，在油画技巧上都有很深的工力。这两位老年的画师，无疑的对于埃及现代艺术教育，有很大的贡献，许多青年的画家，都是在他们的努力培养下获得成就的。

综观埃及的艺术展览，给我们以新鲜的感觉。我们熟悉于古代的埃及艺术，但接触埃及的新艺术，这还是第一次。通过这些艺术品，我们对于埃及现代文化，埃及人民的生活，有了更深的了解。它表现出埃及劳动人民的勤劳、勇敢、健康、乐观，争取自由，争取独立，热爱和平的坚强意志；这些优良的品质，同我国的人民是共同的。因此通过这些艺术的形象，使我们更加热爱埃及人民。愿我们在文化艺术的交流上，在争取世界和平的事业上，永远携手并进。

中印文化的交流^①

中国与印度,是世界最古的两个文明国家;中国与印度,又是亚洲的两个土地最广、人口最多的国家。国境相邻,人民互往还,互助互爱,互相交换文化的成绩,自西历纪元以后有文献的记录上,就是如此,今后我们预见也还是如此,因为中国与印度的人民,在古代文化上都有伟大的创造,都酷爱和平,在今天已奠下和平友好的基础,传承着自古以来的友谊,将来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加高加固。在过去中、印两国不仅在宗教、哲学、文学上互相照耀,就是在艺术的各种表现上,也像并蒂的花枝,互吐芬芳。两国人民的文化生活,早经互相尊重,互相融注,今后继续地发展和交换物质的与精神的文化成果,不正是我们今天的责任吗?

中国与印度的古代文化,原来是各自独立发展的。但从史前的甘肃彩陶文化起,在形式上与印度史前文化遗迹的发掘品,从哈拉巴(Harappa),从摩亨佐·达罗(Mohenjo-daro)出土的古陶,已呈现类似之点。两者有无文化传播的关系,尚未见专门学者们论列。到雅利安(Aryan)人从伏尔加河流域南下,通过伊朗高原,突破兴都

^① 原载《新建设》1952年第5期。后收入《中国古典艺术》，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11月第1版。又收入《东方艺术丛谈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56年11月第1版。又收入《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》，文物出版社1984第1版。后又收入《常任侠文集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版。——编者

库什山脉,到达印度的五河(Panjab)与恒河(Ganges)流域,发展了雅利安人的文化,这个文化才是与汉文化交会的主流。雅利安人从他们游牧的旅途中,携带着他们原始的信仰,在波斯曾留下最古的文学《圣阿韦斯他》(Zand Avesta),在印度曾留下最古的文学《四吠陀》之一的《梨俱吠陀》(Rig Veda)。约在纪元前 1500 年间,从这部文典中,已可看见古印度的经济发展,以及习俗、仪礼、宗教、文学等等。到纪元前 800 年,而有了婆罗门教,到纪元前 500 年左右,而有了佛教。佛教兴盛以后,到中国的东汉时代,才由中央亚细亚的陆路传入,从此沟通了中、印文化的关系。中国人以虔诚的心愿,不辞艰苦地前往印度,印度人也以虔诚的心愿,不辞艰苦地前来中国,来者去者,相逐于途,通过了雪山旱海。文化便从这些人的艰苦跋涉中,传播了种子。由于宗教,更传播了印度人的哲学、诗歌、传说、寓言、民间故事、音韵学、医学、武技、幻术、音乐、舞蹈、绘画、雕刻等等,特别是后四种艺术,在中国土地上生了根,开放出更美丽的花朵,至今还作为中国人与印度人最好的友谊的表征。

古代中国人与古代印度人,都是爱好诗歌的。《诗三百篇》与《四吠陀》的古圣歌,是两大古文明国遗留下的珍宝。但就叙事诗来说,中国不如印度发达,《摩诃婆罗多》(Mahabharata)是印度最古的大战史诗,出现于纪元前 3 或 4 世纪,现存 20 万颂,它的原本或者成于吠陀时代,是世界最长的古诗。蚁垤(Valmiki)的《罗摩衍那》(Ramayana)较为晚出,长约 2 万 4 千颂。前诗出于西印度,后诗出于东印度,这两者至今还是印度家喻户晓的诗篇。其后马鸣(Asvaghosa)的《佛所行赞》(Buddhacarita)与迦梨陀婆的《罗怙世系》、《童子出世》等,都是很长的诗。特别是《佛所行赞》,译为中文后,对于中国的诗歌,发生很大的影响。像《孔雀东南飞》、《秦

妇吟》这样的诗中新体,可能便从印度的长诗影响而生,在敦煌千佛洞中所发见的“变文”古卷,无疑的是佛教文学在中国的产品,其后的“宝卷”、“弹词”,都从这个源流推演而来。至于传说、寓言、民间故事等,中国与印度所流传的往往从一个母体诞生,其中面貌情节相似的不少,谁受谁的影响,已颇难考查明白,足见人民与人民间互相贡献智慧的果实,由来已久,就成为血肉相连的关系。又如唐、宋人的传奇小说,其中常说因果报应,入冥转世,南柯黄粱,幻化诙奇,这些多不是中国人固有的思想,掺杂着不少印度人的在内,因此在文学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调。至于音韵学与医学,其中双方关系之深,多有专家论述,这里不再探讨。古印度的“五明”,随宗教的传播以俱来,加上中国人的智慧,更有了新的发展。中、印学术的互相浸润,成为一个整体,对于中古时代文明的贡献,不止一端,要以艺术的成就,在东方独具异彩,下面我们将摘要加以说明。

一 音 乐

音乐从印度的吠陀时代,就很被人民喜爱,因此附属于《娑摩吠陀》的有《乾闥婆吠陀》(*Gandharva-Veda*),也就是音乐学。汉译佛典中的乾闥婆神(*Gandharva*),也就是音乐神。在古吠陀时代,印度人即具有勇猛快乐的人生观,所以爱好游戏娱乐,在《梨俱吠陀》中,即记载着体操、斗羊、弓术、竞技、唱歌、音乐、舞蹈、野游等游戏。声乐与器乐,在很早的梨俱吠陀时代,就已经并行了。当时的印度人所用的乐器有笛(*Vana*)、太鼓(*Dundubhi*)、尾那(*Vina*)等乐器,来代表管乐器、击乐器与弦乐器。到佛教时代,乐器的种类,就更多了。如《妙法莲华经·方便品第二》所记“箫、笛、琴、箏、篪、琵琶”

琵琶、铜铙钹”等，俱见于敦煌壁画与云冈石刻中，可知很早已传入中国。其中箜篌一种，在汉代已能仿制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、《孝武本纪》以及《汉书·郊祀志》，都说汉武“塞南越，祷祠太一后土，始用乐舞，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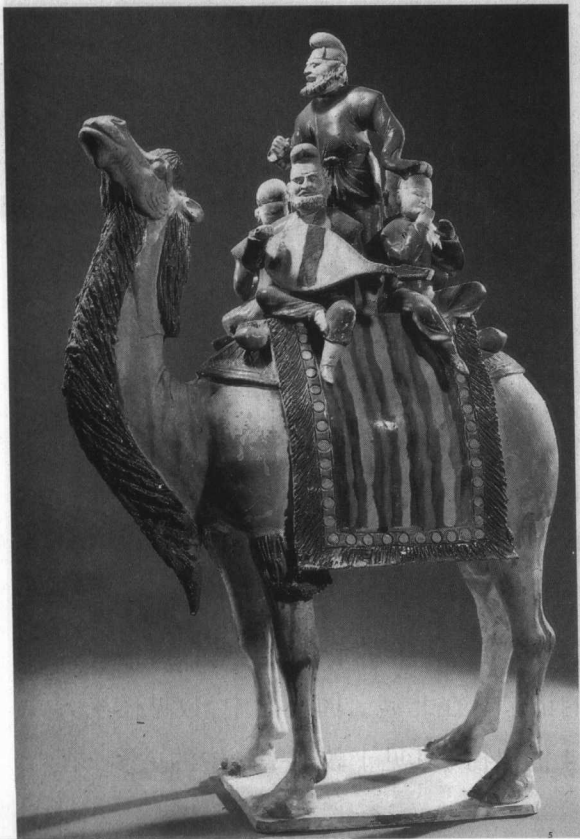
敦煌北魏乐舞壁画中乐舞人横抱琵琶情节

及空侯，自此始”。应劭《风俗通》也说：“武帝令乐人侯调始造此器。”空侯一名，或作坎侯，其后又作箜篌。为隋、唐乐调中常用的弦乐器。《隋书·音乐志》中，记载箜篌出自西域，非中夏的旧器，因此译名无定。法人伯希和曾有考证。箜篌在汉代输入，盛行于时。因此诗中有《箜篌吟》，《孔雀东南飞》中有“十五弹箜篌”语，大概弹奏者多是女子，与今欧洲妇女弹竖琴(Harp)相类。箜篌在印度，可视为古代的代表乐器。因此在印度文学及汉译佛典等书中颇多关于这个乐器的记录。在北魏云冈石刻中，数见伎乐人抱有此器。云冈雕刻，为4世纪物。其见于敦煌壁画中的更多。在

印度佛陀伽耶发掘的石刻有弹箜篌图,为4世纪中叶至5世纪初叶,笈多王朝时代的古艺术品,与云冈石刻,约略同时,均可见古代箜篌的形状。到后汉时,又由西域输入竖箜篌,唐杜佑《通典》说:“竖箜篌,胡乐也。汉灵帝好之。体曲而长,二十二弦,竖抱于怀中,用两手齐奏,俗谓之擘箜篌。”今传有北魏黄花石刻《奏箜篌图》。箜篌到隋、唐时,又东传于日本。现日本奈良正仓院,尚存此器,为唐代的旧物。又日本古乐图中,有《奏箜篌图》,也与北魏石刻弹奏之法相似。此外又有凤首箜篌,敦煌壁画中,绘有其相类的东西。《隋志》、新旧《唐书·乐志》、《通典》、《唐六典》、《通考》各书所载的天竺伎中,都有此乐器。《通典》说:“凤首箜篌,颈有轸。”《文献通考》说:“凤首箜篌,出于天竺伎也。其制作曲颈凤形

焉。扶娄、高昌等国凤首箜篌,其上颇奇巧也。”由此可知这种乐器出自印度,到西域颇为发展,其后传入隋、唐的宫廷,又东而到日本。日本平安朝中叶惠心僧都所绘的《阿弥陀如来圣众来迎图》,右侧有一菩萨,置箜篌于膝上弹奏,即是凤首箜篌的变形,今藏高野山佛寺中,尚可考见这个乐器的形状。

西域的又一主要乐器是琵琶,琵琶是古



唐三彩骆驼载乐俑

代印度与波斯所共有的,相传也在汉代传入中国。《隋书》卷十五《乐志》说:“今曲项琵琶竖箜篌之徒,并出自西域。”刘熙《释名》说:“批把,本出于胡中,马上所鼓也。推手前曰批,引手却曰把,象其鼓时,因以为名也。”此种乐器,既出西域,名称应该也是域外语的译音。古梵文的 Bharbhic,义云拨弦,或者是其语源。与刘熙《释名》的音义并用,大略相同。当西历纪元前后,希腊的弦乐器 Barbiton,与古波斯语的 Barbat,以及6、7世纪时,波斯萨山王朝的乐器 Barbat,这些乐器与传入中国的琵琶,形制都相类,大概都是来自一个语源。萨山朝的古琵琶,在当时传下的银皿中,还刻着这个形象。《宋书》卷十九《乐志》引晋傅玄《琵琶赋》序说:“欲从方俗语,故名曰琵琶,取其易传于外国也。”可知外国方俗语中,已先有了这个名称。刘熙《释名》写作批把,应劭《风俗通》写作枇杷,大概到了晋代,才写作琵琶。因为取谐外国的语音,所以最初无固定的写法,与箜篌的情形相同。

由西域传入的琵琶,在汉、唐时期的文献中,约有三种。一种叫阮咸,一种叫曲项琵琶,一种叫五弦琵琶。唐杜佑《通典》卷一四四《琵琶条》说:“今清乐奏琵琶,俗谓之‘秦汉子’。圆体修颈而小,疑是弦鼗之遗制。傅玄云:‘体圆柄直,柱有十二。’其他皆充上锐下,曲项,形制稍大。本出胡中,俗传是汉制。兼似两制者,谓之‘秦汉’,盖谓通用秦、汉之法。……五弦琵琶,稍小,盖北国所出。”又同条说:“阮咸亦秦琵琶也。而项长过于今制,列十有三柱……晋《竹林七贤图》阮咸所弹与此类,因谓之‘阮咸’。”阮咸近似中国原有的乐器弦鼗,或者是受外来琵琶的影响而创造的。斯坦因发掘高昌阿斯坦那(Astana)古墓,所得绢本的彩绘断片,为唐代的遗物,有女子所抱的乐器,与阮咸的形状相类。又北魏所遗犍陀罗式石刻有天女执秦琵琶像,也是阮咸的一类。其他两种,曲

项琵琶与五弦琵琶,则纯是外来的乐器。后两者见于敦煌壁画中,也见于云冈石刻中,弹奏的人皆横抱怀中,弹时用拨板,从北魏起到唐代的造像与绘画中,都是如此。与后世的挡弹竖抱不同。这三种琵琶的实物,由唐传到日本,现尚存于奈良正仓院中。观其形制,正与《通典》所说的相合。

四弦曲项琵琶,又称为屈茨琵琶。屈茨、拘夷、丘慈、归兹、屈支、龟兹都是 Kucha 的异译,即今库车。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说:“屈支国,管弦伎乐,特善诸国。”在当时龟兹是西域诸国中最能吸收印度文化,更加发展创造的民族。印度文化的东来,到龟兹是一个中间站。龟兹的管弦伎乐,传入中国后,在隋、唐的宫廷中,居于主导地位。据日本林谦三氏的《隋唐燕乐调研究》(郭沫若氏中译本)说:“此种四弦曲项琵琶,发祥于西亚细亚地方,为波斯、印度、中央亚细亚诸地重要的乐器之一,隋、唐胡乐中,天竺、龟兹、疏勒诸乐皆使用之,也就是苏祇婆琵琶七调所用以协律的乐器。”

龟兹琵琶的传习,与七调的输入,对于中国的中古音乐变迁,影响甚大,这里不能不略加说明。龟兹琵琶之名,始见于《通典》。《通典》卷一四二说:“(后魏)自宣武以后,始爱胡声,泊于迁都,屈茨琵琶、五弦、箜篌、胡笛、胡鼓、铜钹、打沙罗、胡舞,铿锵镗镗,洪心骇耳。”又卷一四六说:“后魏平中原复获之(龟兹乐)。有曹婆罗门,受龟兹琵琶于商人,代传其业,至于孙妙达,尤为北齐文宣所重,常自击胡鼓和之。”龟兹琵琶亦称为胡琵琶,所以《北史·恩幸传》说:“胡小儿曹僧奴子妙达,以能弹胡琵琶,甚被宠遇,开府封王。”曹氏原为龟兹人,妙于音律,自北齐至唐,父祖子孙兄妹,皆精于龟兹琵琶。这个新的乐器,在当时就风靡于朝野。

印度琵琶七调的传入,又是由于龟兹音乐家的媒介。当周、隋